

王陽明集



王陽明集新序

許肅天

世人嘗說中國民族，安息於地上；猶太民族，安息於天國；印度民族，安息於涅槃。這三大民族的特性，把個全部東方民族的真相都顯露出來了。什麼是安息，簡直的說是偷懶，是等死罷了！人生下來，一動也不須動，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嘴；終日坐在一間屋子裏，昏然而睡，瞢然而覺，不用腦筋，不動氣力；天上落下來，地下長出棉來，又飽又暖，養着這豬彘式的東方人。從小養到老，從老養到死；天生他好好的，一副筋骨腦血，眼看着他備而不用，活活的安息一世，到最後葬送到棺材裏去，做蛆蟲的食料！這不是東方人所最羨慕最希望的福氣人麼？可憐！這福氣人，到如今福也享盡了，氣數也到了；橫截裏殺進一般西方勢力來，拿他的物質打敗我們，拿他的經濟壓迫我們。倒也！倒也！東方人倒爭，東方文明被西方文明打倒了！眼見這個東方福氣人，將永永遠遠踏在西方人的腳下，奴隸牛馬，萬劫不復呢！

雖然，我們這班東方人，也不是自己願意做福氣人的，尤其是不是自己願意做萬劫不復的奴隸牛馬的；這大半是老天害我們的，這老天害得我們真好苦。這老天的耽誤我們，正好似從前滿清

進關的時候，把他的八旗子弟，駐紮在全中國幾個繁華熱鬧的地方，受漢人的供養；正經事業也不做，正經技藝也不學，終日提鳥籠，坐茶館，鬬口，打架，講究吃着，調戲婦女。養得他昏天黑地的，自己忘記了時辰八字。到了民國手裏，一聲革命，八旗子弟和他的皇帝都成了廢人，他的生計，也要民國替他籌畫，他的皇室，也要民國優待他。民國政府自顧不暇，他們平日既無一技之長，祇得活活凍死的凍死，餓死的餓死；連那溥儀先生，也天天押着賣着過日子。這不是那八旗子弟和溥儀先生自己的錯，這明明是進關時候滿清皇帝因寵愛自己種族，寵愛自己子孫，耽誤他的。我們東方人，也因老天寵愛我們，養得我們昏天黑地的，自己忘記了時辰八字，耽誤得我們成了這個祇圖安息的懶性。

我從前和吳稚暉先生閒談的時候，也說起東方人的思想。吳先生說：

「歐羅細亞中央地方，有一座高原，——歐羅細亞是歐羅巴亞細亞兩大洲的總稱，見李大釗着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，刊入七年七月言治季刊中——是世界人種的發源地。那時人類分作兩大系：一系向東走，一系向西走。向東走的人，所經過的地方，都是平原廣場，天產豐富，氣候溫和，人住在這地方，得天獨厚，可以不費氣力，便得溫飽。因此慢慢的養成惰性，終日閒着沒有事做，便在思想上發展，產生出許多宗教家來，像釋迦牟尼、摩罕默德、耶穌等便是。那向西走的人，所經

過的地方都是崎嶇的陸地，曲折的港灣，土地貧瘠，天氣寒冷，樣樣要拿人力去和天然奮鬥，吃盡辛苦，纔能解決衣食住三大問題。他們的腦筋，終日在物質上發展，便產生許多科學家出來，像牛頓、笛卡爾等便是……」

這一段話，可以和日本金子馬治說的：「歐洲文明，淵源於希臘……希臘國小多山，土地磽瘠，食物不豐，故多行商於小亞細亞，以勤勞爲生活，歐式文明之源，實肇於此。」——見學藝雜誌第三號金子馬治講演東西文明之比較——這番話，互相證明。所以向西面跑的一系人，以勤勞爲生活，他的結果，便產生出今日的西方物質文明；而他的大弊，便在於好勇鬪狠，向東面跑的一系人，以思想爲生活，他的結果，便產生出昔日的東方精神文明；而他的大弊，便在於怠惰自甘。我常聽得人說：印度人因得天獨厚，生活簡單，坐在恆河岸畔吹吹簫，便算過了一天光陰。還聽說檀香山的人，他口渴了，有椰子，肚餓了，有香蕉，棕樹可以造屋，椰殼可以代瓦，他們終日聚着一羣男女，手拉手一大串跳着叫着，算是一生的事業。這種享受，果然是老天的寵愛，也是老天的虐待。如今眼看着印度人亡了國，南洋土人滅了種，這不是虐待却是什麼？唉！東方民族啊！你太要圖安息了。照這樣子安息下去，果然祇好安息於天國，安息於涅槃了！人間却没有你安息的地方了！

爭虧得還有一句「中國民族安息地上」的話，替東方人撐回萬分之一的面子來。但是，這句話也有幾分失了效力；老實說，我們中國人，何嘗想安息於地上？要安息於地上的民族，第一，必須要發揚一種特有的文化出來，團結精神；第二，必須要練成一種強固的保衛力，以抵禦外侮；第三，必須要組織一種相當的生活力，競爭生計；第四，要教育成一種適應環境的智識力，免為時代之落伍者。這四大部分，我們中國人一樣也不注意。智識落伍，也不知羞恥；生計迫蹙，也聽其然；強鄰四逼，也祇知含垢忍辱。照這樣子下去，莫說想求安息，便是想在地面上得一立足的地方，是不能夠！此種大病，是在不能發揚我們特有的文化；精神一散，人心一死，從此休矣！

中國原有可以安息在地上的固有文化；在周秦時候，思想發達，文明燦爛；老莊的人生觀，莊子的老，積極的人生觀，有墨翟，消極的人生觀，有楊朱，中庸的人生觀，有孔孟，講法治的有商，講功利的有荀韓；這種種思想，種種主義，倘能繼續下去，不失他的傳統精神，發揚而光大之，不論那一種那一派，都可以成一種特有的文化。後來專制政治的權威，一天深似一天，思想的壓制，也一天重似一天；所謂思想界學術界，都落於虛偽寂滅的一流。到了中世紀，佛家的勢力入了中國，印度的思想界和中國的思想界，行了一個結婚禮；他的父母，都含有東方頹廢的特性，小孩子在肚子裏，受著專制

厭世的胎教，生出來的孩子，虛偽的越法虛偽了，寂滅的尤其是寂滅。這裏面要分兩個時期：第一個是晉唐時期，第二個是宋明時期。第一時期，是從晉人的清談，而入於唐人的詩賦，成功了一種樂天派的人生觀；第二時期，是從宋人的理學，而入於明人的講學，成功了一種詭辯派的人生觀。這兩個時期儘搬弄着清雅玄妙四個字，把個中國思想界鬧得烏烟瘴氣，益益沉寂，益益埋沒；所謂中國固有的文化，遮攔得毫無光彩。這都是受安息於涅槃的佛學思想所賜。在這兩個時期裏，却也出了兩個特殊人物，大聲疾呼的把中國固有的文化抬一抬出來，醒醒大家的迷夢。在前有一個韓昌黎，在後有一個王陽明。韓昌黎是完全不曾受過佛學的毒，所以他闢起佛來，雷厲風行，光芒萬丈；可惜他當時承八代文衰之後，祇顧文體上的改革和振作，這闢佛主觀的思想，却變成了文學上客觀的資料；在闢佛的事業上，反少了一層工夫。所以後來祇在文學上受了些影響，在思想上却受不到如何的影響。這王陽明却不然了，他生在舉國談玄說妙明心見性的時候，所謂宋儒的理學，明儒的講學，扭扭捏捏，說東道西，什麼太極，什麼無極，什麼性惡，什麼性善，儒不像儒，釋不像釋，千言萬語，自己也不會摸清頭路！這都是一點佛門種子，在裏面作怪！他們一開眼，祇見什麼程朱，又是什麼馬龍鳴樹，遠不見莊老孔墨，近不見荀韓申商。他們嘴裏所道的孔孟，都是假記的孔孟，實在已深深的入了佛

門的迷途。便是王陽明，他入手之初，也不免墮落玄虛；後來豁然大悟，提出「良知」兩字來，指導人有一個獨立的精神，不可磨滅的毅力。他最精要的幾句說話道：

「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，則事物皆得其理。夫以知識爲知，則輕浮而不實，故必以力行爲功夫。良知感應神速，無有等待。本心之明即知，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。不得不言知行合一。」——明儒學案姚江學案

他這幾句話，是教人求實在，明本心，不尚虛浮，也不求近功。「良知」之說一出，所有一切邪魔外道，空言浮文，一齊打鎗；既切於實用，又不偏於物質。王學實在不但是打破佛學輕浮不實的病，且也是調濟西方物質文明的偏枯，是可以發揚我們東方文化的特性的。照此做去，纔能安息於地上。你若不信，且看那日本，他們信仰王學，已有幾十年了，人人知道培精神養毅力，產生出神聖不可侵犯的「大和魂」去發揚他的文化，擴張他的國力。這原是我们的傳家之寶，願我們大家去拿回來自己享用；本着良知良能的精神，去發揚我們中國的文化，擴張我們中國的國力，庶幾還有安息在地球上的一天。

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二日，在上海，

馬湘伯序

夫芻豢稻粱，食之美者也；而病者食之，反受其害；害之分數，與病之分數，恆有遞加之比例焉。今歐風東扇，而我被之；往往事雖極美，而求其根與果，不爲反比例者，十不得二三。顧先我而被之者，明季不受其害；後我而被之者，東隣且轉貧爲富，轉弱爲強，國不疑民，民不疑國，功實之不同，至於此極。其故何歟？好學深思之士，得毋幡然自訟曰：『是必我有病矣！』病之受害，心病爲甚，形病次之，心者，人之所以爲人也；心既病，則通體皆病，作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，作於其事，害於其政，有斷然者。故曰：『謙受益，滿招損。』損，猶害也；滿者，非心病而何？先儒恤然憂之，程朱以降，思所以救正人心之病之害者，不一。其弊不一，其方各本微危精一之傳，六經四書之蘊，倡爲道學理學，或以主敬窮理標宗，或以先立乎大標宗，或以自然或以復性，或以隨處體認等標宗；其書具在，至有明稱極盛焉。而陽明良知之學，尤足以統攝諸宗，易知易行，不失古聖人覺世牖民之精意；近代儒者置焉不講。然猶不敢以講者爲非，而陰附以名高者有之，及新學明興，隄然疑怪以駭曰：『是倘恍迷謬之談，非利用厚生邦族爭存之義，久爲近世西儒所不言而不知。』西學真儒，方深痛邪說頗行，淫于立法，詭于原理，逢君經民

以之陰陽食報，故辨晰秋毫放距甚力。有就宗教而言者，茲姑不論；論其就性理而言者，則首言爲人之理；次言實踐之道；卽致知科所謂原行是矣。蓋乃必有所終止，譬彼行邁人必先定所止，不能戾止，斯負此行；行背定向，北轍南轅者，謂之迷惑；行偏定向，或左或右者，謂之玩愒，皆不合於智者之行。知此則知原行當先，原終止終，止定而后能靜，能安，能慮，能得。得者，得所終止也；得之最後，定之最先者，其惟大學所言「至善足爲人所終止乎」？終止惟一，至善亦惟一，無以上之謂也；有之則不得，謂至，謂終。故曰：「天下何思何慮？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」慮者，慮此也；慮以行之，行以赴之，毋或偏於左若右，乃得謂之智者。智者能明理者也，能辨是非者也，能辨是非，乃能辨好惡，而自主其行止，能自主其行止，乃有善惡功罪之可言。然使性分中無不可侵犯之名分，則行止何以自由？故首言爲人之理，可分爲八：

(一) 原終止，人之有行也。——應否止於至善，至善維何。

(二) 原人行，其異於獸行者伊何？原夫生之爲性，從其小體，人心是矣。形我也；理義之性，從其大體，道心是矣。神我也；一我，一心，一體，一性，而行有不同，有屬於我而無待於我者，如血脈之流動是矣；飢欲食，渴欲飲，其欲也自性則然，無待我願，雖禽獸亦能之。惟以禮食與不以禮食，則其權在我，權在

我者，或從心所令。——謂以我心之權，施於視聽言動。——如以禮食是矣。或從心所發，而僅囿於方寸之間者，如上所言，定靜安慮是矣。今所原行，原其我有自主之權者耳，而侵擾此權者，內之則情慾之惑，外之則威力之加，故又連類及之。

(三)原善惡，人行之有善惡也，以主觀言，則心之官有二，曰：「明德。愛德。」仁愛者，心之德也，以愛人爲大，大學所以繼明明德而曰親民者。——親，猶愛也。——陽明子不改從新民者，以此心之官不蔽於物，故明德愛德皆能止於至善，能止而不志焉，能擇而不執焉，於是有善有不善，善惡以客觀言之，如「怨天尤人」之行斷非善，「悲天憫人」之行斷非惡，此善惡之有定者也；其無定者，則定之以志行所止。一言以蔽之曰：「順乎秩敘則謂善，反是則謂惡。」故曰：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」而足以左右我善惡者有三：一在外，性法是矣；二在內，曰：「良知。」曰：「習能。」以故四原習能。

習有善惡，因之德有吉凶；凶德之尤凡七，而樞德有四并附焉。

(五)原性法有禁令，有賞罰，責人以從善避惡，不啻十手十目之嚴。就其未宣布言，則名天理；既宣布後，則在良心，故其爲物也，乃天理留貽於人心者，異常不變，而爲一切法令之淵源。法令者，必維持公益，非禮，非義，非人才力所堪任者，皆不得垂爲法令。

(六)原良知，乃幽獨中辨知天理良心性法所繫與令者也；事前之告戒，事後之慊疚，雖皆良知之功用，今則止論臨事之因應。陽明子有言曰：「良知之於節目事變，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；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，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。」惟規矩誠立，則不可欺以方圓，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；尺度誠陳，則不可欺以長短，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；良知誠致，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，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。然則良知者處事之準繩，不可不從，不可不致，尤不可不戒慎恐懼，學問思辨之有素也。

(七)原功罪，言善惡之行，有益有損，有足報稱也。以狹義言：足報稱者，須足以資報，以受益受損者，非分所應受；益不報賞，損不報罰，則非稱物平施之道矣。若受之者而爲社會社衆，則凡功罪之行，加於社衆之一者，猶加之社會；加之社會者，猶加於社衆，由是同社之功罪，有相通之義焉。社會而不知此，觚哉！觚哉！若責報者行不善惡是問，是梓匠輪輿之食功也，原行所不論。

(八)原名分，此天與便宜行事之權也；無此權，則善惡不能擔認。人固一身善惡，有不容推諉之責任者也；則一身動作，有不容侵犯之名分決矣。設有侵犯，理可力爭，惟不得有傷社會之治安；然其權不由人定，譬若官骸之用人，各受自性天性，天豈由人定哉？乃若其權之用，則物主之權，間可辭讓；

而財政之權，則非執政者所可操縱。——以社會亦有相當之名分也。

以上八章，章各條節，若干題系，若干專行，譯本尚不多見。次言實踐之道者有二：一言行己之職分。二言合羣之職分。職分者，對於名分之稱，有當盡之義務焉。行己之職分，凡三：上對於天，內對於己，外對於人。人己之交，物主之權，尤重大較已，散見於詩書語錄，而李二曲先生之會約及顏天約等於所以對於天者，尤有合焉。合羣之職分亦三：言處家，處國，處天下。以先天之理想，澄結社之源流，或推窮世變，虛設案情，如引例案之爲者，務使事理一無遁形。竊意春秋者，殆卽此類之案，當判詞或僅口授，或待質疑，非卽以經文爲讞語也。如此，則春秋誠萬國寶書，爲治家國天下交際之學者，所不容數典而忘矣！奈何後儒道在邇而求諸遠耶？西儒以爲「邇莫邇於吾心」，道學者，心學也。心學者，實踐形也。心爲一身之主，不愛不欲，則不能實踐；不實踐，非道學也。實踐而無職分，名分以維繫之，則人道太苦。職分者，敬讓仁愛而已。——敬讓者，義務之實。——不仁愛，則敬讓亦僞。名分者，禮法而已。無形之禮法，非人人固有之良知乎？故爲人之理，與實踐之道，在治其心，修明明德愛德，皆以至善爲歸而已矣。天下之亂生於不愛；不愛則離，愛乃相翕。孔子曰：「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」謂人心之邪正，無關於天下之治亂；邦族之存亡者，必自妄談西學者始。西學云乎哉？異端而已矣！程朱以性理學與

西儒爲最近於醫我國人心之病爲最宜。病何在？蓋不勝言——亦不忍言。無已則無勇。其勇也，生果無恥，其後果也。惟無勇，故見義不爲，惟無恥，故無所不爲。人至無所不爲，尙勝言哉？尙忍言哉？吾不敢謂爲禽獸而人面，爲盜賊而衣冠，而其爲狂，爲惑，爲病夫，而諱醫滔滔者，自欺欺人，天下皆是矣！爲舊學，則挾惟恐見破之私意，爲新學，則又無從善服義之公心，各懷妒嫉而不考情實，苟妄功利，隨聲是非，學界且如此，又何怪自洋藥開禁以至仿開學堂，根與果無一非反比例耶？知善不行，謂之狂，知惡不改，謂之惑，惟狂與惑，非知行不合之病歟？西儒有恆言：「大勇不自欺。」凡自欺者，非不致良知之病歟？吾故曰：「治吾通國之病，惟陽明之學近之。」西學東漸而東隣知行並進，豈無故哉？自明末逸民立昌明學校於江戶以來，蓋不徒新舊學數巨公卓卓在人耳目者，知重陽明也。凡舟車之頃，手陽明一卷者，望之不盡皆學士大夫，宜其勇於變法，勇於立憲，勇於敵凱，勇於地方自治，在在知行並進，並身受陽明之益而不自諱。我國學士大夫對之能無羞死？芭南方觀察憤然羞之，羞我家有青囊，病不知用，愚孰甚焉？爰取施評王集捐廉鉛印，公諸不諱病者，及諸新學能視宗邦之病如身病者。以蒙嘗從新學之後，久爲世所詬病，而新建當時舊學，亦嘗自爲新學矣。然其所建樹成已成物之功，要非諸舊學空談心性者比。意者方公欲以舊新學惠我新新學乎？自問從事新學之病，大都務外遺

內博而寡要則新建良知之學，有以藥我無窮者，皆方公之賜矣。謹書以自警，若以序陽明，是荆公所
謂「佛頭著糞也」，非方公之意，冀何敢？

嚴復序

丙午長夏，方君芭南、魏君蕃實重刊陽明集，要三種成，證復爲之序。自念如復，不肖何足，以序陽明之書？故雖勉應之，未有以報也。冬日，邂逅江上，魏君又以爲言。且曰：『非得序，無以出書。』既辭不獲，則曰：『嗟乎！陽明之書，不待序也！』夫陽明之學，主致良知，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，爲其功夫之節目，其言既詳盡矣；又因緣際會，以功業顯終明之世，馴至於昭代，常爲學者宗師，近世異學爭鳴，一知半解之士，方懷鄙薄程朱氏之意，甚或謂吾國之積弱，以洛閩學術爲之因。獨陽明之學，簡徑捷易，高明往往喜之；又謂日本維新數鉅公，皆以王學爲向導，則於是相與偃爾加崇拜焉。然則陽明之學，世固考之詳而信之篤矣；何假不肖更序其書也哉？雖然，吾於是書固亦有心知其意而不隨衆人爲議論者，可爲天下正告也。蓋吾國所謂學，自晚周秦漢以來，大經不離言詞文字而已；求其仰觀俯察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——如西人所謂學於自然者——不多遘也。夫言詞文學者，古人之言詞文字也；乃專以是爲學，故極其弊爲支離爲逐末，既拘於墟而束於教矣。而謀其所得，或求諸吾心而不必安，或放諸四海而不必準；如是者轉不若屏除耳目之用，收視返聽，歸而求諸方寸之中，輒恍然而有

遇此達摩，所以有廓然無聖之言。朱子晚年所以恨官廢之不早，而陽明居夷之後，亦專以窮理學問大者教人也。惟養爲學者不然，學於言詞文字，以收前人之所已得者矣；乃學於自然，自然何內之身心，外之事變，精察微驗，而所得或超於向者。言詞文字外也，則思想日精，而人羣相爲生養之樂利，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備焉；此天演之所以進化，而世所以無退轉之文明也。知者，人心之所同具也；理者，必物對待而後形焉者也。是故吾心之所覺，必證諸物之見象而後得，其搏火之必然理歟？顧使王子生於燧人氏之前，將無燔烹飪之宜，未必求諸其一心而遂得也。王子嘗謂：「吾心卽理，而天下無心外之物矣。」又喻之曰：「若事父，非於父而得孝之理也；如事君，非於君而得忠之理也。」是言也，蓋用孟子萬物皆備之說，而過不自知，其言之有蔽也。今夫水湍石礙而碎，削作焉；求其聲於水與石者，皆無當也。觀於二者之衝擊，而聲之所以然得矣。故倫理者，以對待而後形者也；使六合曠然無一物以接於吾心——當此之時，心且不可見——安得所謂理者哉？是則不佞所竊願爲陽明諍友者矣。雖然，王子「悲天憫人」之意——所見於答蕭某之第一書者——真不佞所低徊流連翕然無間言者也。世安得如斯人者出，以當今日之世變乎？魏君待吾言弱，則拉雜率臆，書以郵之。

鄭孝胥序

任天下之事者，苟無合羣動衆之學以濟之，將無往而不窮；世教陵夷，民失其學，而士大夫之講學者，高自位置，務爲深遠，故推之入世處事，往往扞格而不能通，而不學者又無所挾持以取信於天下，故其羣愈渙而其種日衰。陽明先生以良知爲教，其言曰：『能爲愚夫愚婦，方可與人講學。』又曰：『語人品者，泰山不如平地。』又曰：『聖人遇此時，方爲此事。』合所言而觀之，知其因時立說，易簡覺悟，但求有濟於當世，固不必與講學者爭得失於毫釐之間也。陽明之事業，多得於用智，而所持良知之說，無論上智下愚，於立談之間，莫不震而服之。信哉！合羣動衆之道，足以徹上下而無阻者矣！先生又言：『三代以下，士之取盛名於時者，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。』我在南都以前，尙有鄉愿之意，既悟良知，真是真非，信手行去，無所覆藏，乃近於狂者之胸次，此非欺世之言也。今世羣學哲學大明於西土，而廖士夫多宗陽明，其功業樹立者，皆足自見於當代；獨中國之鉅公學子，猶持鄉愿同流於汙之術，以媚垂賤之世。嗚呼！吾決其不足以自立，爲蟲爲沙，必隨劫灰以蕩滅而不可復振也。陽明征思田，極言用兵之害，孝胥視龍州，專保完善，不務追剿，而流匪饑困自散，始知陽明之智識有迥絕於